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三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〇一期 ——
(二〇〇二年八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208b)

【专题研究】文革中的领导与群众：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二之二）	萧喜东
【史海钩沉】文化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	杨小凯
【自由论坛】致一位新左派朋友的信	萧功秦
【往事追忆】红卫兵小报和我（十八）	周孜仁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专题研究】

文革中的领导与群众：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二之二）

• 萧喜东 •

（续上期）

◇ 全国各地：党委高压政策与大规模群众抗争

如果说，在北京的大多单位，冲突的双方集结为多数与少数、造反与保守两大派群众，并且结合了某种社会阶层集团之间对抗的维度，而原党委（特别是高校）和新市委的角色退居幕后，那么，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党委、市委“代表党”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原有等级秩序的势力和影响还阵容强大，盘根错节，而冲突对抗更直接地发生在本地和串连的少数派学生与当地党委（甚至是省市最高领导人）之间。《“文化大革命”简史》对这一阶段的记载是：“发展为全国范围的‘炮打’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以围困、进驻、揪斗等方式，使很多地方和单位的党政领导机关普遍受到严重冲击，难以正常工作。”对中外学生运动史和官方镇压学生运动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在这类对峙冲突中，受到严重打击的，几乎毫不例外的是手无寸铁的学生，而恰恰是为了镇压学生，官方机关不仅要正常工作，而且必须超常工作，以调动各种暴力和非暴力的资源。而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全国各地学生与当局的冲突，正是重复

了这个学生运动的惯例。在北京的中央，于8月21日、22日和9月11日分别发出三份政策性文件：《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中央军委指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中央批转公安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其效果与其说是有效地令行禁止，毋宁说是直接透露了全国各地党委普遍地动用军队、出动警察镇压学生、鼓动工人农民围攻学生的严重情形。

首先看一例校园内的事态发展，在这里官方运动的政治迫害和北京一些高校类似，甚至更为严重。在四川省，“十六条”所体现的话语和政策转变，还根本没有迹象。1966年8月上旬，各大专院校的官办文革或文革筹委会，在原省文革大学组的统一部署下，在学校全面开展了“批三斗四”（批三类、斗四类）运动。他们计划一校一系抓一、二个人进行重点批斗，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后，再以教研组、班为单位广泛开展批斗活动。争取一个半月批斗完，以后就是改，国庆（一九六六年）拿出成果，向国庆献礼。“他们妄图就这样把四川的文化大革命草草收场”。“他们批斗的对象，绝大部分是运动初期被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打出来的‘三、四类’革命群众（革命的教师和职工），其中很少几个是当权派，而党内走资派当时几乎没有揭发出来的。”拿成都工学院为例：当时被打出来的明的“三、四类”教师就有二百一十六人（不包括当权派和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及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在内），其中还有个别学生，占全院教师总人数的26.2%，而暗的“三、四类”的教师比明的“三、四类”还要多一倍以上，有的教研组甚至多两倍以上。明的和暗的“三、四类”教师加起来约四百多人，占全院教师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他大专院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8月24日晚上，西南局党委书记李井泉和当时四川省文革小组组长周颐来到成都工学院作了一系列指示。8月25日，各系文革分别向师生员工传达李井泉指示。“于是，工学院少数掌权的打手们，在其黑主子的一声号令下，纷纷起来声称要对‘牛鬼蛇神’采取‘革命的暴力行动’。一刹时满院到处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牛鬼蛇神’，头戴高帽子，身挂黑牌子，四处游街示众。到八月底为止全院约有二百多革命群众被戴高帽子游街。当时，全院每个角落一片斗争‘牛鬼蛇神’的吼声。从此，各系各教研组都私设拘留所，对明的‘三、四类’革命群众完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被抄家，被关进私设的拘留所，天天被提审斗争，受尽了种种迫害。”六六年九月，院、系各级文革又成立了监管组，私设了劳改队，对明的“三、四类”群众，经院人事保卫部门审批，党委决定，实行就地监督劳改。规定劳改人员必须制定出本人的“劳改计划”和“守法公约”，天天逼迫写“劳改日记”。每天挂着黑牌劳动时，还常常逼迫这些革命群众唱“牛鬼蛇神嚎歌”，如有反抗就被罚站、罚打、罚做苦工。有的同时还被剃了阴阳头、画花脸，受尽了肉体上的种种侮辱。这一迫害暴行，于8月25日以后，几乎是各大专院校同时进行的。（24）

如果说，校园内部还表现为过去官方政治运动的运动群众、矛头向下的恐怖模式，并被推向极端的话，那么，校园外和社会上的事态发展，呈现为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学生闹事”，即在繁华闹市、政府机关附近，数量众多的人群集结，不满和诉求的矛头对准当局的群众性街头抗争，以及针对他们的反示威人群。

下面，就来看一下有关材料对各地事件的简要描述：

《大事记》记载：8月28日，“李井泉和重庆黑市委任白戈之流一手制造所谓的‘八·二八’江北惨案，对革命造反派进行政治陷害，他们调集工人赤卫军和郊区农民，把首都赴渝红卫兵和重庆革命派打成‘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前哨部队’，进行残酷围攻。”

“云贵高原上，六月份一片白色恐怖，八月下旬，首都南下串连队杀进贵阳。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先是拉拢，让红卫兵住豪华的交际处、贵阳饭店。首都南下串连队没有上敌人的

当，冲破他们的包围圈，和贵阳革命学生、红卫兵一起战斗、生活。走资派恼羞成怒，凶相毕露，大喊‘谨防政治扒手’，调集数万不明真相的群众，残酷围攻首都红卫兵，制造了‘九·五’‘九·六’‘九·七’事件，首都红卫兵‘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连续三天上街大游行，大长革命造反精神。接着，又帮助贵阳地区革命派成立了‘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福州“八·二九”事件：8月29日中午，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林学院、同安一中等校的师生，为了声援厦门八中师生，到省委要求叶飞接见，但叶飞认为“有坏人捣乱”，以在开常委会为推托迟迟不出去接见，引起了师生的愤慨，一直到下午六点才被迫出来接见。但对师生采取对抗的态度，从而引起了抓人、打人的事件。（25）

文革后的一份官方材料记载：8月31日，以浙江医科大学红卫兵为主的近万名师生，集合在省委大楼前，“炮轰”省委，要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出来接见，历时一昼夜，江华没有出来接见，即以静坐抗议。

同一材料还记载了9月7日“金华事件”：当天，杭州化工学校赴金华串连队贴出了“六问金华地委”的大字报，九月七日金华师范学校学生写了“炮轰司令部——金华地委”的大字报，并要贴到金华地专机关内，与地专机关的干部、群众发生争执，展开辩论，“有的学生被挂牌，戴高帽游斗。有两千多人参与围观。一直延续到16日。”（26）

其他一些材料也显示了同一省份内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事件在时间前后上的影响和联系。广西自治区较早的一次事件是桂林“八·七事件”：八月五日，广西师范学院的造反派（即后来的桂林“老多”）在工作队撤离时，写出了《送瘟神》的大字报。八月七日，当局调动成千上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和群众，对广西师院造反派进行围攻、殴打。

紧接着发生了桂林“八·一九事件”：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广西军区第一政委韦国清先后调动人民解放军驻桂一四一师五个连进驻桂林市内，还准备派出一营部队进入师院抢出工作队，并且扬言必要时可以开枪镇压。在八月末的一次厅局长会议上，韦国清说：“桂林‘多数派’是右派操纵的，他们有八百多人，加上南下串连队和一些工人，有两千多人，虽然不会都是右派，但是他们在右派控制之下是肯定的。”

随后，又发生了南宁“九·九事件”：南宁的造反派和南下串连队，为声援桂林造反派，抗议区党委，在广西区党委院内进行静坐绝食。区党委调动“盾牌兵”、“赤卫队”等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围攻，造成一次轰动全区的事件。（27）

各地发生的事件不仅在时间上高度重合，而且在内容、形式上也惊人地不约而同。现有记录但详尽程度不一的其他事件有：上海“九·二一·九·四”事件，青岛“八·二五”、“九·一”镇压学生事件（《人民日报》1967年3月28日李元荣文章有所提及，但无详细说明），西安“八·四”到“八·二五”流血事件，以及沈阳、昆明等地的类似事件。

1966年8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与到北京告状的外地同学的谈话记录，透露了有关西安交大“八·一六”抗议省委遭到镇压事件的一些细节，有助于我们了解有关当事人的主观感受，故部份抄录：

陶铸：同志们来到这，天津问题复杂，看来问题大的还有西安、兰州和四川等地。今天我光听一个西北的，一个西南的，怎么样？（同学们：“好”！）

西安交大：16日下午2：00左右，我校革命师生和其他兄弟院校革命师生一起，在省委门

口静坐示威，是他们逼出来的，我认为是革命的行动。不知中央首长怎么看。

陶铸：这当然不能说是反革命行为。（鼓掌）省委问题没有检查好，你们去省委是对的。他们打伤多少同学？

西安交大：不大清楚，听说打伤了三百多人（有人插话：恐怕还不止。）

陶铸：今天西北局来电话承认打伤了三人。我们正在调查，听说你们还抓住了三十个干部。

西安交大：我们静坐是十分有秩序的，我们让他们从队伍中间通过，要让受害者和目睹者认出凶手。凶手中间有些是省委、西北局机关干部。如西北局基建委员会副主任马广任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一小撮右派闹事，说我们的校徽是反革命标志。我认为，这一系列严重打人事件是省委一手策划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迫害。

西北大学：杨植霖（西北局文革小组长），在西北大学污蔑我们的静坐和日本人民对佐藤政府一样。

陶铸：你们来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西安交大：他们在西安站安上两个大喇叭，骂我们是以交大为首的狗崽子。（插话：还有盯梢，跟踪。）

陶铸：过了潼关就听不见了吧！（众笑）你们有住的地方吗？

西安交大：还没有，我们刚来还没有落脚呢！

陶铸：请人大同学安排一下好吗？

人大同学：完全可以！

陶铸：地方上不欢迎你们，中央欢迎！（鼓掌）李世英同志来了没有？

西安交大：没有。

陶铸：李世英是个好同志，不是革命的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来，他的信我看过了。

西安交大：我们根本不相信省委了，我看省委应该改组。

陶铸：这由你们决定。（长时间热烈鼓掌）

西安交大：同学们对打人，造成了重伤、流血十分愤怒，到了省委门口静坐表示抗议，有五十多个单位，五、六万人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静坐。

陶铸：省委楼那么大，坐坐算什么。

西安交大：有人贴大字报，并高呼：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

.....

西安交大：十五日我们收到伪造党中央电报：“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省委！”这两句口号是错误的。大家听到后十分高兴。我们刚游行宣传，就觉得是假的。我觉得这是个大阴谋。他们组织人来打我们，这是有计划的行动，绝不是一般的行为。

.....

陶铸：.....运动搞得好不好，就靠十六条，就靠你们。十六条公布后，你们有什么变化吗？

西安冶院：变得更坏了，这就是铁证！（拿出撕得粉碎的衣服）

这次谈话，还有以下内容：

兰州铁院：我们那儿也没变好。《十六条》公布以后，还发生了流血事件。八月十六日还组织围攻我们打伤六十多人。现在我校还是被困，学生一出来就要挨打。

.....

（这时，北京红卫兵带着兰州铁一中的五位同学进入会场，陶铸同志和他们一一握手，他们哭着控诉了甘肃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滔天罪行。）

兰铁一中：省委马继孔指使兰大同学围攻我们，我从三、四点钟一直跪到晚上11点多，还让我们朝西跪着。他们打了我们六百多人，光下跪就二百多人，当时就有30多人受了伤，我们跪在那里心里难过，我们要见毛主席啊！（许多同志都哭了，陶铸也掉了眼泪）我们本想让省委检查，可是省委马继孔说什么兰大同学打我们是革命的行动。打得好，打得对，打得准，今后还要打，他们把毛主席象撕破，逼迫我们拿手榴弹刀子对着毛主席象让他们拍照。.....

下面，我们看一下有关材料对一些事件的较详细的记载。

成都“八·三一”事件：8月31日，北京和成都的师生在西南局和省市委静坐集会要求领导出来接见他们。“李井泉对这个要求采取‘放、顶、拖’的方针（放，就是让‘牛鬼蛇神’放出来；顶，就是碰到问题要顶住；拖，就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便拖时间），同时要机关干部‘坚守岗位，沉着应战，不要打人，经受严格的政治考验’。在李井泉的这些黑指示下，西南局和省市委立刻出现了一种战时的气象：转移档案，烧毁罪证，囤积食品，组织机关红卫兵，组织大批干部守门、守楼梯口，成立广播站，进行欺骗宣传，转移重点人头，监视‘不可靠’的干部等等。”黄新庭（西南局干部）还加派了一个加强班携带报话机进驻西南局办公大楼设立观察哨。西南局、省市委领导人借口“气氛不好”，拒绝接见学生，并说：“现在问题看得很清楚了，不到一定温度牛鬼蛇神不会出来。”西南局的负责人认为“形势紧张”，在机关办公“不安全”，于是在西南局办公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筹建“二线”，并把“二线”设在公安厅X处；另外还在省高级法院设了一个备用地点，准备必要时转移出去。“‘二线’专门收集学生运动的情报，后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专门刺探学生运动情报的西南局机关九人密探小组。

九月初，一名省委负责人在省委召集的各大专院校“大联络员”会议上说：“学生过去几次由于未抓到省委什么大问题，总想借口在成都地区制造匈牙利事件，把罪责强加在我们头上。要组织学生戳穿这一阴谋。”按照李井泉的指示，“现在革命干部没有发言权，工农兵说话就是

围攻学生。革命干部和工农兵只有通过他们的子女来说话，因此要组织工农送子参加红卫兵，还要登报宣传”，即宣传“送子参军”（即参加官办的红五类红卫兵），并说：“这与革命战争时农民送子参军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另一位领导人说得更明白：“因为文化大革命不能动用专政工具，所以红卫兵（指红五类红卫兵——笔者注）特别是纠察队行使某些职能……”。

“此后，接连几天，不仅在人民南路，英雄口、西南局、省市机关、各大中学校展开了对革命学生的围攻，而且在重庆、南充、自贡、富顺、新津、彭山等地也掀起了镇压学生的高潮。造反派师生惨遭迫害，备受折磨，有的遭到残酷斗争，有的被逐出家庭，甚至不少人被杀害，出现了全省范围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

1966年国庆前夕，省委领导人给省、市各机关作指示：“今年国庆不同于往年，外地来了一小撮，城里也有很多坏人，红卫兵（指造反派——笔者注）要闯进机关闹事”。省文革小组的负责人在国庆节前几天就对学生的情况作了反复研究，把成电、成大、成地等学校学生安排到某些工厂和所谓力量较强的单位十一游行队列中间，发生情况时以便采取对策。在国庆前的晚上大学组负责人李文平还亲自给一些巡视员布置，到观礼台对一些观礼代表进行监视，并指示：“有代表递条子要求发言，要劝阻，条子不要上交”。国庆这天，会场布置格外森严，李文平等人亲自到观礼台指挥，来回巡视。在游行时，音乐学院的学生抬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大幅标语，并喊了这个口号，事后，省委大学组的人说：“龟儿子，大家伙整倒了，小家伙没有整住。”（28）

发生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是集体行动中人数和战术上的较量，更是对概念和现实的解释上的斗争，是话语权的争夺。这期间最著名的一次语言上的斗争，缘起于9月15日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即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上的讲话中的一句话：“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这篇讲话，是经毛泽东审阅过的，但文革发动者出于何种理解、何种目的把它写进讲话，以及是否逆料到它的重大后果，都不十分清楚。然而，这句话在当时所产生的巨大反响，却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就是使各地党委和保党委的势力喊出了“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来镇压造反派，形成了一次所谓当权派的“九月反扑”。（29）

林彪讲话所带来的冲击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此时已调任中宣部副部长）根据他所理解的林彪讲话精神，在九月二十四日所作的著名的“抓黑鬼”动员报告。“这个报告动员各级党组织反击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坏份子。因十六条明文保护学生，所以抓黑鬼运动主要是在工人、干部及非学生市民中进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参与的五类分子都受到打击，有的被单位关押，有的被关进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活跃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在“九·二四”前后，湖南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大抓“黑鬼”时，曾说过：“原来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理解，现在理解了，就是要抓呀！文化大革命，原来是这样搞的。”（30）

再以四川省为例说明党委当权派对林彪讲话的欣喜和兴奋：西南局、四川省委于9月16日、23日在东方红宾馆开了两次联络员会议，省文革小组的张力行说：“从现在的形势看来要么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被打垮，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要么就是无产阶级打垮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另一位领导人分析说：“有些坏家伙把西南局、省市委工作中的缺点提高，扩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炮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林彪同志讲话发表后，左派更坚定了，中间的分化了”。“文化大革命最后决战是学校，即是最后‘红五类’专‘黑五类’的政。现在工农不能参加辩论，解放军不能干预，老干部说话不解决问题。因此，只有‘红五类’来向‘黑五类’进行斗争。斗胜了，就锻炼出来了。工人、农民和干部要动员弟子参加红卫兵，红

卫兵没有力量，就不能把‘黑五类’压下去。”〔31〕

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在接见群众的各种场合下，澄清林彪讲话，以扳回影响，比如，张春桥、关锋十月七日在中南海接见福建师生时说：“有的人抓住这句话（即林彪的话）说：‘我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打我。’林彪同志讲的话并不是指革命同志批评省委市委。”

另一份材料揭示江西省委领导人当时的举措和心态：“九月初广大革命师生揭省市的阶级斗争盖子，向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革命行动刚刚开始，省委的某些领导人就吓得要死，慌忙开会采取应付措施（一）从省委干部中挑选50名身高体壮力气大的人在大楼门口值班，防止学生冲大楼，防止学生伤害领导，为省委领导人保镖。（二）派出一批干部每隔半小时骑自行车上街巡视一遍；把学生的动静报告给省委，以便及早应付。一次工学院附属工厂的报喜队，前往省委报喜，被这些干部误认为是工学院的学生来省委‘闹事’，于是调出大批干部守卫大楼，真是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结果守卫大楼的干部人数远远超过了报喜队。（三）为了应付学生，层层设防：第一线是一些干事，第二线是科、处长，第三线是厅局长，还有第四线，第五线。”

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1966年9月15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言说：“街上发生的自发辩论出问题，不如组织红卫兵维持秩序。组织形式叫纠察队还是什么？……九月六日晚，省委院内情况乱，如组织工人赤卫队前来维持秩序，这要讲清楚，在十天内，把这工作抓好！”

这份材料还收录了“江西省委给中央并主席的报告”，这个报告写到：

现在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中已有较强烈的反映，他们说：“难道中央和毛主席光要知识分子了？”目前所造成的一些现象，促成了他们的这种看法。……目前的作法，都是把广大工农兵丢在一边，只相信学生，所有学生都是革命的，各级党委书记都成了革命对象，并且还得支持他们，稍一怠慢就是反革命或保皇派，就要一律打倒。这样一来，工农兵为主体这句话就成了空话……上述的一些作法，翻遍主席的所有著作也找不到，我们深感到，假如这样继续下去，不仅会影响运动正常进展，也大大影响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威信。现在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看到一些学生不讲道理，敌视、围攻我们的情景，流下了眼泪，怀疑党是否有这样的政策。——摘自江西省委给中央并主席的报告〔32〕

如果说，共产党原有的“基本群众”，即广大工农及工农家庭出身的人们，的确对“十六条”发表后领导与群众关系的巨大变化产生疑惑，那么，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体制的内在矛盾本身，造成了不同的阶层成员对有关事件的互相矛盾、互相对立的看法和体验。

我们最后不妨来看两个来自个人角度的叙述。第一个是有关长沙“八·一九”事件前后的一些情况，回忆者本人当时是长沙市一中学生，于七月初被湖南省委派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学生，罪名是参加了学生中的非法组织活动。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长沙的高干子弟以省委书记的子女为头也组织起“红色政权保卫军”，誓死保卫省委、市委和红色江山。市委书记孔安民模仿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这些红卫兵。我当时根本不敢想象，红卫兵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前一段的“非法组织活动”其实并不非法。记得八月五日，工作组把正在参加双抢的学生叫回长沙，在军区大操场听刘少奇，周恩来，和李雪锋的录音报告。全场四周贴着标语“同学们万岁！人民万岁！”听了录音报告，才知道派工作组，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犯下的“错误”。好久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些录音报告是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工作组的人神色紧张和故作镇静，工作组员特别走到我们这些反革命学生面前观言察色，并警告不要妄想翻案。因此我虽然知道“十六条”中特别规定，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要允许学生自组政治组织，并要保护少数，但在省委工作组的迫害威胁下，我不敢妄想翻案。……

因此我看到长沙的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心中感到恐惧，心情大概与当年犹太人看见褐衫党成立时一样。我旁观了长沙一中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立大会，虽然这是长沙第一个非正式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但他们宣暂时杀气腾腾，誓死保卫省、市委和共产党红色江山，而且声言要打击狗崽子和形形色色的右派，黑鬼。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的学生也自组了政治组织去市委示威游行。市委马上把工厂的党团员组成赤卫队，并动员红色政权保卫军去市委保卫共产党。那天湖大的学生被几千人围攻，殴打，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事件。据说当时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类似事件，市民分为两派，一派由党团员骨干组成，以反右积极分子的姿态保卫省市委，另一派支持被保守派围攻的学生。

……

当时造反派的大字报提出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组）和罢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官的口号。傍晚时分，一队不整齐的产业工人的队伍游行到市委，他们看去刚下班，穿着工作服，举着打倒三相信的标语。路旁的市民欢呼雀跃，我不禁热泪盈眶。”（33）

第二个回忆，摘自韩丁著《百日战争：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所转述的一位清华学生八、九月份在新疆串连的经历。

我们分头去乌鲁木齐市的各个中学。我们发现压制群众很严重。第一中学有学生写了批评省委的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这些学生的家长被警告，要他们断绝家庭关系，不然就停发工资。

我们所到之处，都被人群包围，他们喊：“王恩茂万岁！”王恩茂是自治区主席和党委书记。我们是在一个独立王国的心脏地带。显然新疆党委没有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定，这个决定要求撤销工作组，但新疆党委对所有学校都派了联络员，实际上起工作组的作用。我们决定要找到王恩茂。我们二十个人挤进党委接待室，要求见王恩茂。

“你们是什么人？”接待员问道。

“我们是北京的红卫兵！”

这个人进去了一下，然后把我們领到另一间接待室，一些人出来和我们握手，其中之一就是王恩茂。

“我们的工作按照中央的指示进行的。”他说。“工作组已经撤了，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欢迎你们批评建议。”

我们于是就把我们知道的说了。我们批评他们：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的谈话都由坐在后面的四位秘书作了记录，还录了音。

一开始王恩茂面带微笑，但后来脸色变了。我们要求他派人到下面去解决压制群众问题。我们说：“如果你不这样，就会走向反面，从革命转变为反革命！”

我们一回到住处，就来了许多人和我们辩论。他们管我们叫“北京来的右派”，说我们在北京臭得混不下去了，才跑到新疆来捣乱。

为了回答他们，我们写了两张大字报：《炮轰王恩茂》和《支持中学生的造反》。结果很多普通人来找我们。我们越研究发现问题越大。不仅造反派受到围攻，围攻也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刚一贴出大字报，就被人围住要求辩论，我们走到哪里，一辆带大喇叭的广播车就追到那里，不停地攻击我们，甚至一直追到大学食堂。9月3日，我们又去王恩茂的办公室去抗议对我们的围攻，并向他宣传周总理的讲话，但他拒不接见。

但许多受压的人支持我们。我们中午去王恩茂的办公室，一直等到下午。我们宣布，开始绝食，直到王恩茂出来和我们辩论。我们在自治区党委大院里静坐，和我们一起静坐的有两三百新疆学生。我们一边静坐，一边开会揭露王恩茂的反动路线。

为了打断我们的讨论，党委的大喇叭高声广播：“你们的行动是反革命的。你们和苏联在印度的代表一样坏。”当局发动了和我们一起静坐的新疆同学的家长和兄弟姐妹通过大喇叭喊话。

“我是你妈妈。你千万不要让北京来的反革命把你给骗了。如果你继续错误行动，我就要和你决裂。”家长们都这样说。

但我们坚决反击。许多普通人见到这种压制情况，纷纷加入我们的行列。尽管饿着肚子，我们仍决定派人到街上去宣讲揭露真相。我们讲了我们的绝食、王恩茂的反动作法和文化大革命的高涨，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我们当中。我们也越来越有勇气了。但我们整天没吃东西，非常饿。那天晚上，寒流来了。我们从北京来，只穿了单薄的衣服。现在我们在露天中冻得发抖。新疆同学于是给我们送来一整推车的毛衣和厚衣服。所以我们坚持静坐，事态越搞越大。

最后，王恩茂担心无法收拾，在第三天凌晨四点终于出来了。他在我们前面的台子上坐下来，周围全是保镖。这是一场闹剧！

“你们最好结束示威。”他说。“你们的态度是错误的。你们要见我，现在，我在这里了，你们好好看吧。”说完，他就回去了。

我们决定：不应该继续绝食了。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起码王恩茂出来了。于是，我们解散，找东西吃，并在街上继续斗争。（34）

上述“九·三”绝食事件一定给新疆群众造成了极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后，绝食成为新疆群众所熟悉并一再运用的一种斗争方式，比如后来十一月三干会议期间乌鲁木齐上千人的绝食事件，和震动全疆的“一二·一九”绝食事件。

今天的主流文笔下，一个最显得深刻的比喻，就是把“文革造反派”和“希特勒的青年”、法西斯运动中的“党卫军”联系起来。（35）在这里，除了“造反派”一词后来也成为身份争夺的对象而造成指涉上的混乱之外，仅仅从尊重社会科学的概念范畴、从而使社会史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的话，这种捏造的形像联系也是对史实和常识施加污辱和暴力。就本文所考察的时间阶段和有关案例而言，造反派的集体行动方式，和现代史上受法西斯或右翼势力迫害而奋起反抗的弱势群体的抗议行动和民权运动，倒是有些相似之处。不用回溯到三十年代，在文革的同时代，就能找到中国群众造反运动的社会学等价物。比如，1963年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黑人和平抗议行动，以及1965年阿拉巴马州塞尔马市和蒙哥马利市南方黑人和北方同情者的游行，这是美国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史上的著名抗争，它迫使美国总统以联邦名义取缔南

方种族隔离政策，而群众在抗争过程中，都遭到了有压倒优势的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镇压，更遭受了白人三K党的极端暴力围攻和迫害。

◇ 结语：有关文革研究

现有文革研究的状况，可以这样描述：有关文革意义的阐述和争论还远远未能基于史实，因为有关基本史实仍处于被严重地歪曲、掩盖和颠倒的状况。仅仅以清华“八·二四”事件为例，这样一个对整个文革都有重大冲击影响和标志意义的群众性事件，在主流文革史里竟然被根本忽略和掩盖，这就相当于：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竟然略去不谈1791年7月17日在马尔广场保皇势力对群众的大屠杀事件，而企图去解释后来国王的被废和被处决，去解释后来发生的革命恐怖。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都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在法国大革命中，以无套裤汉为主体的群众性集体行动，被历史学家称为“发生了革命斗争的一天”（“*journee revolutionnaire*”），从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单位。一场重大的革命通常包括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次这种事件，它们形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有着时间顺序的（这对叙述历史的是非原委至关重要）一个结构，事件序列不仅对当时人们的意识有重大凝造作用，而且也成为革命的“自然史”，是研究考察革命历史的出发点。

主流文革研究至今仍然缺乏这个最基本的“自然史”的框架，这样说的根据是：主流历史叙述，和历史现场中的大多数人们对事件和人物的理解、和原始文献所论及的问题和意义，不仅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且几乎毫不相关。具体说，这里面存在着四个严重的模糊和颠倒：时间顺序上的模糊、颠倒，人物派别的模糊、颠倒，重大事件和次要事件的模糊、颠倒，以及精英和群众谁起决定性作用问题上的模糊、颠倒。

官方史学的模糊、颠倒又从而导致对最基本事实的认识上的矛盾和混乱（比如：“血统论”及相关恶行是否应该归罪于中央文革和造反派；抄家、“破四旧”的暴徒，是否也是抵制“四人帮”的英雄），因而造成文革历史让人感到捉摸不透，如同盲人摸象，如同一潭浑水。认识上的最大混乱，又往往导致最大的简单化。

本文和笔者的其他有关文章试图重新发现以群众事件为分析单位的时间序列结构，而这不外是将被歪曲、被掩盖的文革运动的自然史加以恢复和昭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文革运动所明确表现出来的各个阶段（如五十天、从“十六条”发表到批资反线开始，从批资反线开始到“一月风暴”等等），辨认出最有标志意义的重大事件，考察其在时间一空间上的分布，比如在文革中，只有象“八·一八”接见红卫兵这样的少数事件才具有直接的全国的意义，而各地大多数重大事件是在学校或省市当局的政治管辖范围内展开的。其次，研究群众集体行动中的诉求、派别、联盟关系、行为套路上的因循和创新，特别是本文所涉及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在行为套路上的系统区别。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不仅致力于揭示群众运动的自然史，也有它本身所具有的学理研讨结构，是对前人有关其他群众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研究进行评论和对照，从而对有关文革的比较研究、对提出真问题大有益处。比如：激进主义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从高涨到低落的情形，热月反动的发生时刻和背景，雅各宾主义精英的历史作用和下层群众诉求的意识形态意义等。

象《“文化大革命”简史》和《大动乱年代》这样的官方权威史著，自然也有其学理研讨结构，但很明显，它过于头重脚轻地倒向精英一边，从史学本身的历史看，精英史最终总是因其对社会认识的苍白而显得陈旧，而让位于各种各样的群众史。

其次，官方权威史著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对原始材料和事实来源的极度轻视。关键性的事实陈述通常是没有注解和引文的（《大动乱年代》相对好一些）。当然，官方史学家能看到内部的、秘密的档案，因其秘密性质，注明来源本不可能，也没必要，因而，我们必须相信官方史著中所有未注明出处的论断，我们必须服从信息垄断者对真理的垄断。然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斗争还不是“过去”，还在以权力的不平等为基础、以对真理和真相的封锁和压制为方式在持续着。

这个问题并不限于官方史著，而是在非官方色彩的主流文字中发展到极端。其中最典型的就中国所特有的纪实文学。高默波对此评论说：“叶永烈和戴晴属于这类纪实文学作家，他们很少引证文献资料。他们很自信，以为相信他们的话就象相信文献资料所证明的一样的天经地义。”（36）这个问题和上面所谈的缺乏自然史基本框架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有关文革的文体，其特色就是：彻底无视真问题、无视事件的轻重大小、混淆人物派别、混淆时间阶段、以奇闻轶事作史料、直至混淆真实和想象的界限。作为历史知识的当今大部份文革纪实文学和回忆录，与同样主题的虚拟文学，如小说、电影并无差别，它们都是以“画面生动的、阴森可怖的和奇闻轶事的”“真实”来对历史的真问题实行喧宾夺主。

史料问题是一切群众史、下层史所历来面临的问题。有讽刺意味的，也使许多群众史学者感到不安的是：群众史的资料来源恰恰最离不开国家机器，因为最丰富的有关普通人的信息通常是由国家所收集和掌握的，比如：居住和税收记录、生卒嫁娶记录、警察机构的档案等等。鲁德所作的法国大革命中的人群的研究，就主要是根据巴黎各区警察的逮捕审讯档案。另一类资料来源，是各种各样书面的和口述的民间回忆材料。公开出版的、已经成为一大文学部类的文革回忆录文学，它们的作者绝大多数来源于同一社会阶层，所反映的体验、价值观带很大狭隘性，这已被一些人所指出，其实它实际上已成为官方文革话语的一翼。而广大群众的口述史的工作，不仅根本还未展开，而且面临着一开始就被文人的书面史所操控、假冒的危险。（37）

还存在着一个中间层次的资料来源，这就是报纸和民间出版物。大众印刷和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兴起，也成为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史的一个重要来源。查尔斯·提利的《英国的民众抗争：1758—1834》（38）和相关的开创性研究，是依赖报纸对群众集体行动事件的报导作为数据主要来源的范例。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稍有不同，这里关注的重心，是作为文革独一无二的特殊产物——群众出版物。这不仅是最丰富的信息来源，而且本身就是历史，是必须发掘、研究、和评价的对象。如果以对群众出版物的研究作为衡量文革研究的尺度，那么，今天的文革研究还处在蒙昧落后的状态。最最基本的第一步，是把群众出版物作为文革史的首要原始文献，对其进行登记、整理、分类、出版，什么时候对群众出版物的全部面貌有了大致的了解和掌握，严肃认真的、学理意义上的文革史研究才算真正开始。（39）

本文和笔者其他相关文章，绝大程度上依赖群众出版物作为信息来源，以群众出版物所提供的事件描述和评论作为建立文革自然史框架的指南。这里不存在对群众出版物所代表的立场和价值观盲目认同的问题——笔者在文中总是力图批判当时精英和群众参与者对文革意义的理解（经常是互相矛盾或自相矛盾的理解）。显然，群众出版物按照其各自的派别立场，是带有系统的倾向性和片面性的，而这种倾向性和片面性恰应该作为史料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解读和分析，正如同：今天大量的文革回忆录资料，其倾向性和片面性恰恰是体现今天社会主导意识的掩盖、颠倒功能的标本案例。从这个角度讲，本文的目的还是极为初步的和有限的，即在于：辨认出对群众的意识和行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有关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使其成为今后进一步梳理文革运动过程的路标。为了回应官方和主流著作中不加注解、不引原文的风格，笔者有意采用了大段引用原文、较少加以评论的行文方式，同时注意保持每个事件的叙述情节的完整性。因而产生的效果是：文章看上去更象一个资料的汇集。这也许是对作为史料的群众出版物受冷

落、受歧视的矫枉过正吧。重要的是：使更多人了解，存在着一个不以奇闻轶事为内容的文革历史，这样的历史才能真正帮助我们反思过去，吸取教训。

注：

(1) Albert Soboul, *The Sans-Culottes: The Popular Movement and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1793-179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xix. 批评者自己也是马克思主义解释的代表人物，因此这属于马克思学派的自我批评。

(2)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3-10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a World-Historical Event*. Social Research, LVI, 1, Spring 1989.

(3) Soboul: 同(1)。George Rude: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这些新历史学派的学者大多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方向。有关法国革命的语言研究：Hunt: 同(2)。William Sewall: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The Language of Labor from the Old Regime to 184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4) James Harvey Robinson: "Recent Tendencies in the Stud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 (1906): 529-47, pp532.

(5) 旧文化研究方法的代表是: Lucien Pye and Sy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Richard Solomon: *Mao's Revolu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新文化研究方法的代表是: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Basic Books, 1973。E. P. Thompson: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3。以及上面提到的: Hunt, 1984。Sewall, 1980。

(6) 周恩来十月三日接见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中，有更详尽的分析说明。领导人讲话材料，除注明者，皆来自《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编，1997年，该汇编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全国文艺界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及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966年11月编印的《中央首长有关文化大革命讲话材料汇集（一）（二）》、北京汽车分公司文革大字报办公室1966年12月编印的《大字报选·第一、二集》、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印刷厂“红印工”战斗队1966年12月13日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宣传组1966年12月编印的《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1967年3、4、5月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第1、2、3、4集）、国家科委系统红卫兵联络部1967年1月编印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集（第一、二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967年2月编印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一九六七年一、二月）》、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6年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7) 按照当时的办法，是由群众的揭发、辩论来决定一个领导人“是不是走资派”，在实践中，群众在语言上所创造的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将斗争的形式分成“火烧、炮轰、打倒”这几个级别层次，这样为群众一开始怀疑当权派、给他提意见（即火烧）提供了一定合法性。

〔8〕《“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北京五十五中的表现》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学战线》1967年7月12日。

〔9〕唐夕阳《血泪控诉》，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勤务部宣传部《大喊大叫》1967年2月22日。

〔10〕对于文革中的迫害与反迫害，有必要专文论述。有关同一期间北京市中学的情况，可参考相关的原始材料：《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血和泪的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在北京女三中的滔天罪行》，首都红军兵团宣传部《红军战报》1967年3月8日；《关于刘邓工作组在六十七中干部问题上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调查报告》，北京中学红代会《中学红卫兵》1967年5月20日；曹家珍（北京西城宣武门小学）：《红心永向毛主席》，北京市小学红旗造反团《首都红旗》1967年2月7日。以上材料都将陈列于网上文革文献馆：<http://geming.20m.com>

〔11〕《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12—1967·10·1》，首都部份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北京。p89。

〔12〕红代会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战斗报》编辑部干部问题调查小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又一铁证（北京广播学院干部问题调查报告）》，《首都红卫兵》1967年4月29日。

〔13〕《大事记》，p90。

〔14〕赵欲李：《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干部的迫害》，北航《红旗》1967年4月6日。

〔15〕《“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院执行情况的调查报告》，（这篇调查报告还透露：十一月初，造反派造了张学文的反，“首都红卫兵”的头头为了效忠校党委，马上采取报复，一夜之间有组织有计划地抄了二十二名运动中因敢于造反而被打成“反党分子”、“叛徒”的普通政工干部的家，有意转移锋芒。可见两派的分裂、保守派的优势一直延续到十一月。）《我院“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典型——揭露基础课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矿院《东方红》1967年4月25日。有关调查报告还显示：工作组对七月底、八月初的政策和话语转变，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把对工作组“没有放手发动群众”的批评，理解为“左”的不够、残酷斗争的程度不够，然而，他们不理解，恰恰是他们“太左了”的作法，导致了群众的怨恨。调查报告说：矿院工作组撤走前检查自己犯了“右倾”的错误，表现是“该斗争的没及时斗争”“对重点人物‘右倾’”，“该打威风的没打威风”。于是，筹委会要克服“右倾”，就大搞挂牌、游斗等武斗方式。

〔16〕周泉纓：《我心中的文革》。为了和那些烘托渲染“十年浩劫”的文章相区别，而强调本文是以分析为目的，这里再次提醒读者：这是支持刘邓、支持党委体制的保守势力的政治恐怖。（见本刊zk9909a——编者）

〔17〕仲维光：《“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北京之春》第41期（1996年10月）。（见本刊zk9612c、zk9701a）

〔18〕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资料选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一九六七年七月。《大事记》所载的时间和细节略有不同：“下午二时许，清华自控系红卫兵提着皮鞭铁棍抢占了广播台。五点，十二校红卫兵二千余人跑步，进清华园，实行

戒严。……然后，他们就按照得到的名单闯入宿舍捉拿‘混蛋’、‘右派’，进行抄家。”

〔19〕《大事记》，p55，62。

〔19a〕Richard Rubenstein: Alchemists of Revolution: Terrorism in the Modern World. Basic Books, 1974, p128。

〔20〕《大事记》，p59。

〔21〕同〔18〕。

〔22a〕根据1966年11月19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在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同学时的谈话记录，江青有这样一段谈话：“何长工，对地院同学受害（声音已变）我真想跟你们一块去。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听了十分气愤。同志们，如果我不是主席的老婆我就要和你们坐在一起。（激动的哭起来，全场激动的流下了热泪）。”

〔22〕《对西城区三十六所中学和市区教育机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情况调查报告》，北京新四中公社《新四中》，1967年3月17日。关锋在地质学院同学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28日。

〔23〕《大事记》，p65。李富春同志召见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五同学的讲话（1966年10月9日）。

〔24〕《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成都打李总站教育系统联络站《教育革命》1968年第6期。

〔25〕《叶飞向全省人民作检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师院分部《曙光报》1967年1月9日。

〔26〕《浙江“文革”纪事（1966。5——1976。10）》，p12，程超、魏皓奔主编，《浙江方志》编辑部，1989年。虽然描述比较含蓄，但明显这是一例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迫害敢提意见的学生的恶性案例。

〔27〕《韦国清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忠实执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桂林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报》1967年5月10日。

〔28〕同〔24〕。

〔29〕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红色造反派《红色造反报》1966年11月25日的文章《王任重的反动理论——“秋后算账”必须彻底批判》提到：“九月份在全国不少地方发起向革命少数派的反扑”。

〔30〕杨小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五月号。（见本刊本期zk0208b——编者）中学“红代筹”十二中队八一九战斗队：《绝不许王延春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新长沙报》1968年6月1日。

〔31〕同〔24〕。

〔32〕《一批反革命的“自白书”——江西省委破坏文化大革命罪行材料选编》，中央戏剧学院红色造反团《红色造反报》1967年2月9日。

〔33〕杨小凯：同〔30〕。

〔34〕William Hinton,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83—85。翻译是笔者的。

〔35〕比如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写到：“人们可能读过季羨林先生写的《牛棚杂忆》。在书中，季先生详尽地描述了“文革”中，北大大造反派聂元梓等人整人害人的罪恶行径。凡读过此书的人，对北大造反派的狠毒，一定有所了解。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这里不是在谈有关具体指控的真实与否，而是关注它所代表的对历史形像的刻意捏造。

〔36〕高默波：“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是否该偏正一点儿？”，杨建利编《红色革命与黑色造反——文革三十周年纪念研究文集》，二十一世纪基金会，1997年。

〔37〕有关回忆录的批评，见：Mobo C. F. Gao, “Memior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ltual Revolu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7, No. 1, (Jan. —Mar. 1995), pp. 49—58。口述史方面，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就是一例。

〔38〕Charles Tilly: *Popular Contention in Great Britain: 1758—1834*.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9〕网上仍在建设之中的“文化大革命文献馆”就是为了有系统地收集、陈列文革初期群众性原始资料。网址在：<http://geming.20m.com/wenge/wenge.htm>。

（本文根据书稿《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史》的一部份改写）

~~~~~

## 【史海钩沉】

### 文化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运动

• 杨小凯 •

丁抒兄（《人祸》等佳作的作者）正在写一部关于文革历史的著作，寄来文革时北京清华大学造反派向全国发行的一份铅印小报“井冈山”，向我了解此报上一篇批判陶铸的文章的背景。此文提到陶铸在文化革命初期有一个黑八条，并支持湖南的张平化在湖南“抓黑鬼”。由于报纸的语言是文革中的官方语言，与当时实际发生的事情有一段距离，需要我这类亲身经历其事的人才能将其译成现在人们能懂的史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文革中毛泽东如何操纵语言，以使他发动的利用市民对共产党官僚机器不满的造反运动能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内运作。这篇批判陶铸的文章登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出版的铅印四开小报“井冈山”第四版。题目是“坚决彻底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撕开陶铸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画皮”。此文通篇指控

陶铸如何反对毛主席，压制文化革命运动，读者今天一定会认为当时发生的事无非是传统的共产党式的残酷权力斗争。但丁兄还是个有心人，从字里行间发觉当时有一个“抓黑鬼运动”，而这个运动的社会内容是他所感兴趣，但却又不能从文革式的话语系统的迷宫中搞清楚。我在此文中就以我个人在那段时间的经历与这篇批判陶铸的文章对比，向读者叙述当时的史实，也能给丁兄提供一点他的著作所需的史料。

我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初被当时湖南省委派到长沙市一中的文化革命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学生，罪名是参加了学生中的非法组织活动。那个组织没有名称，只是一些对工作组不满的学生暗中的一些聚会。工作组选择打击我，还因为我父亲与当时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一些冲突。我父亲是老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周小舟时的秘书长，曾公开反对大跃进，因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毛泽东把周小舟和我父亲打下去后，从湖北调来张平化的一个班子，这班人文革开始后，仿效北京打击彭真的榜样把我父母定为黑鬼，作为文化革命打击的对象。工作组在批判我前后，向党团骨干披露我父亲的反党材料。

我当时很快就向工作组认错投降，当然对共产党也开始有了仇。我们学校有八位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后，拒不认错，其中后来出名的谢若冰（她父亲与我父亲处境相同）不知如何弄到一些北京来的消息，说是毛主席反对派工作组，江青支持反工作组的学生。于是这八位学生偷偷逃出湖南，去上海、北京找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告状。

当时湖南是省委的一统天下，除了这八位学生，没人再怀疑省委迫害学生的正统性。我对前途失望，感觉到家庭和自己被全社会歧视和不被社会所容的痛苦。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五十年代年右派在政治迫害压力下的感觉。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长沙的高干子弟以省委书记的子女为头也组织起“红色政权保卫军”，誓死保卫省委、市委和红色江山。市委书记孔安民模仿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这些红卫兵。我当时根本不敢想象，红卫兵出现意味着我们前一段的“非法组织活动”其实并不非法。记得八月五日，工作组把正在参加双抢的学生叫回长沙。在军区大操场听刘少奇、周恩来和李雪峰的录音报告。会场四周贴着标语“同学们万岁！人民万岁！”听了录音报告，才知道派工作组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犯下的“错误”。好久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些录音报告是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工作组的人神色紧张和故作镇静，工作组长特别走到我们这些反革命学生面前观言察色，并警告不要妄想翻案。因此我虽然知道“十六条”中特别规定，不能以任何理由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要允许学生自组政治组织，并要保护少数，但在省委工作组的迫害威胁下，我不敢妄想翻案。只是认为“十六条”像共产党所有说得比唱的都好听的许诺一样，没有任何现实意义。

因此我看到长沙的保守派红卫兵成立时，心中感到恐惧，心情大概与当年犹太人看见褐衫党成立时一样。我旁观了长沙一中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立大会，虽然这是长沙第一个非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但他们宣暂时杀气腾腾，誓死保卫省、市委和共产党红色江山，而且声言要打击狗崽子和形形色色右派，黑鬼。八月十九日，湖南大学的学生也自组了政治组织去市委示威游行。市委马上把工厂的党团员组成赤卫队，并动员红色政权保卫军去市委保卫共产党。那天湖大的学生被几千人围攻、殴打，这就是有名的“八一九”事件。据说当时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类似事件，市民分为两派，一派由党团员骨干组成，以反右积极份子的姿态保卫省市委，另一派支持被保守派围攻的学生。

当时我虽同情大学生，但却为他们难过，这是明显的鸡蛋碰石头，一定会像五七年的右派



一样，也会像我文革初的遭遇一样，不会有好结果。我父亲由于他的处境糟糕，特别再三叮咛我不要去支持造反的学生，否则省委认为他是黑手。我虽然向父亲保证绝不卷入，但我还是忍不住去市委附近看大字报。

当时造反派的大字报提出打倒三相信（相信省委、市委、和工作组）和罢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口号。傍晚时分，一队不整齐的产业工人的队伍游行到市委，他们看去刚下班，穿着工作服，抬着打倒三相信的标语。路旁的市民欢呼雀跃，我不禁热泪盈眶。在这个共产党一手遮天，蛮不讲理的世道，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有良心和正义感。但我相信他们的结局一定是悲剧，虽然这悲剧深深感动了我。

看到共产党今天在香港与港督骂架的态势，就使我想起了文革初那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冲突，共产党当时迫害造反派时的横蛮无理与今天可算是一脉相承。它总是把潜在的政治对手一棍子打下去，对任何不同意见总以搞破坏、捣乱、反革命、反政府等大帽子加以迫害。

但是意外的事发生了，《人民日报》不久发表一篇社论，点名指责各地的赤卫队是由走资派挑动斗学生。此文一出，长沙的形势马上改观，湖大的造反司令部有了合法地位，支持他们的造反派工人也纷纷与他们串联，中学也出现了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对抗的造反派组织。

八月十八日时，被省委打成反革命的谢若冰被毛泽东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亲自接见，表示支持。消息传到长沙，省委市委声言反革命谢若冰骗取毛主席信任。不久谢若冰回到长沙，人们终于相信毛主席中央文革完全了解长沙打反革命的情况，并且真的支持为谢若冰平反。

在此同时保守派红卫兵受到挫折，遂将注意力转向破四旧，打砸抢抄出身不好的市民。但到九月十五日时，形势又发生转折，林彪发表了他有名的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讲话。他特别指出有些地富反坏右份子利用文化革命之机，炮打无产阶级各级司令部。这时陶铸派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张平化回长沙，并有一个八条，大意是按林彪这个讲话的精神在各级抓黑鬼。

于是张平化发表了有名的九月二十四日抓黑鬼动员报告。这个报告动员各级党组织反击趁文化革命之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反革命、坏份子。因十六条明文保护学生，所以抓黑鬼运动主要是在工人、干部及非学生市民中进行。很多在文革中有所参与的五类份子都受到打击，有的被单位关押，有的被关进看守所。前一段支持造反派学生的活跃工人都被打成黑鬼，被单位关押、批斗。工人因为不能合法组织造反派组织，所以马上被谮熟政治运动的党组织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但学生有合法的造反组织（因为十六条的保护），于是利用他们的组织与被迫害的工人串联，组织工人上街告状，造反和保守两派形成拉锯战。

我当时因为父母的再三告诫，不敢参加任何组织。我去了北京两次，第二次去京时正是抓黑鬼运动的高潮，我心中彷徨，不知所从。但在北京听到首都三司成立的消息，并了解到中央文革提出了反迫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平反，销毁黑材料，以及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工人平反。这成了使我激动的合法诉求。于是我带着所有这些消息回到长沙，决心把这些消息告诉那些垂头丧气的“反革命黑鬼”。我们家当时还在省委，我于是把各种有关反迫害，平反的首长讲话和北京消息抄成大字报，在省委和机关里张贴。我觉得我应该做些具体的事，于是决定去探访省委内被打成黑鬼的人，把这些新消息告诉他们，并把他们的材料传到社会上去，使人们能帮助他们。省委当时是个常人不能进去的地方，对造反派有利的消息在省委里是听不到。

我了解到省委当时有三个人被打成黑鬼，一个是汽车队的司机，前一段支持湖大的造反派学生，省委代书记张平化亲自点名，说他鼓吹炮打几级司令部，反共气焰比当年的右派还嚣张。

另一位是一位科长，最后一位是省委招待所一位管食堂的干部。我没有找到那位汽车司机，但我找到了那位科长。我见到他时，周围的小孩正在向他投石子，大骂黑鬼周某某。我向这位科长讲明来意，想向他了解他被迫害的详情，他一脸恐怖，根本不敢细谈。我后来又去找他几次，终于说服他讲出了省委把他打成黑鬼的经过。他的罪行是公开发表过言论支持反对省委的造反派学生。省委批斗他时，说他是隐藏很深的右派，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我也找到了那位招待所的干部，他非常勇敢，表示在多次批斗、大字报围攻后，他仍没有认错。省委加给他的罪名是支持反省委的造反派学生，并曾发泄对大跃进的不满，攻击毛主席。他矢口否认他曾攻击过毛主席，并把省委迫害他的详情告诉我。我后来把这两份调查报告，抄成大字报，与中央文革当时支持为反革命平反的消息一起贴到大街上。父母都被我的举动吓得要命，他们几次要撕掉我的大字报，并声称，省委一定会认为我的这些行动都是他们在背后指使。

我虽没参加任何组织，但我支持造反派，我与造反派同学一起到工厂去调查过几次工人被打成黑鬼的情况。当时在造反派学生的支持下，很多被打成黑鬼的工人，教师都跑到北京去告状，有的人自己开着汽车用一个星期开到北京，有的在同情造反派的铁路工人帮助下到了北京。这些告状的工人教师在北京与首都三司接上头，了解到中央文革支持为他们平反，于是自发组织了湖南第一个包括非学生人员的跨行业准政党型组织——湘江风雷。湘江风雷回到长沙后，以“为反革命平反”，烧毁歧视迫害市民的“黑材料”为号召，很短时间内，其成员就超过当地共产党的人数。

不久，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的报告就正式将反迫害，为反革命平反，销毁迫害人的黑材料和批判刘邓资产阶级路线作为文化革命的主题。同时，工人农民被允许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这是刘少奇及共产党组织和保守派在市民中从优势转为劣势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造反派工人和学生，无疑都真心支持这些新政策，他们要付给毛泽东的代价，当然是在党内权力斗争中支持毛而反对刘、邓。刘邓当时的确因为他们文革初对市民的政治迫害而陷入孤立境地。我相信，邓小平很多年后都对那次突然孤立心有余悸，但与其他党内斗争的失败都不同之处是，那次他是真正在市民中孤立了。造反派市民真心反对刘、邓、陶铸、张平化。因此陶铸在文革中的失势不但与权力斗争有关，也与他搞的那次抓黑鬼运动和对市民的政治迫害有关。

从以后邓小平对八九民运的迫害，和在香港与香港市民打交道的蛮不讲理，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党根本没有从文革真正吸取教训。文革不仅仅是毛泽东的恶意，而且有毛泽东成功利用市民对共产党不满的一面。如果共产党迷信自己对政治的垄断权、蛮不讲理，不尊重民意，总有一天在将来中国的政治斗争中，有人会再次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积下的一肚子怨气使整个共产党身败名裂，彻底孤立。

□ 《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五月号

~~~~~

【自由论坛】

致一位新左派朋友的信

• 萧功秦 •

致一位新左派朋友：

来信收到。过几天我将寄上我写的一篇思想手记。其中谈到对当下中国新左与自由派之争

的看法。我对这场论争中的自由派更为支持。

我并不是自由派。对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由派，我历来有自己的批评。我认为一些激进的自由派把西方在市民社会基础上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主经验，抽象为一组可以放之四海的制度模式，以为可以直接搬到中国，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自由民主是好东西，但谈民主不能脱离实现民主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中国必须在经济市场化的有序发展过程中，在利益分化与社会关系契约化的基础上，渐渐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以上所谈的这种抽象的民主观在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有。但当下中国许多自由派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与市民社会对于实现民主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与这些并不主张激进主义的自由派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根本分歧。

在新左派与自由派的争论中，新左派的问题要大一些。我对新左派在评价中国改革以前的左的时代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浪漫主义，尤其是新左派对文革的解释，是很不以为然的。中国的新左派比中国的自由派更相信“好的制度”是可以根据“好的理念”而设计出来并加以实施的。然而，宏观的社会制度不是雨衣与钟表。不能根据人头脑中的蓝图理念来设计。脱离经验事实而根据某种道德原理设计出来社会制度，实施起来肯定是怪物。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根据对人性“美好理解”而设计出来的并强行实施的怪物标本。

那些年青的新左们没有经历过文革（这实在值得庆幸），他们对文革有些想当然的、“审美化”的误读，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缺乏分析这一历史现象的个人体验与生活资源，而文革的“文本”远比其他人类任何历史事件的“文本”更充满光彩夺目的美丽外衣。而你是过来人，说的话怎么也会如此无边无际？你说“再来一次经济上的文化大革命未必是一场灾难”。我把你的观点告诉周围一些朋友，包括过去当工人时的老朋友，他们瞪大了眼睛，你知道他们怎么说？他们问，此人是不是有毛病？令我实在无法理解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对历史上的血的教训为什么竟如此容易淡忘？我们如何对得起那么多在文革中冤死的灵魂？难道为了当代中国人缺少公平，为了争取我们希望他们得到的公平，就必须以否认无数文革受难者受到的文革中不公平为代价？

文革时期我在工厂里做了十二年工人，本人还是三级钳工。深知那种一大二公体制与制度是何等地没有效率，何等地摧残人的积极性。如果根据文革时期出版的报刊来研究文革，那将会如同“把死的说成活的”一样谬误。至于说到文革中的大民主，我倒可以提供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当时我们厂里的一位小青年偷听美国之音加上另外一些什么事情，被人告发收审。当时县公检法认为罪判三年可也，派人到我们车间听取群众对判刑意见，一般工人也没有什么反应。此时有人高呼：“十五年！不判十五年不足以平民愤！”在左的优势话语下，事实上谁也不会对这位立场坚定的人的慷慨陈词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于是，根据“群众要求”，公检法把此人判了个十五年徒刑。这就是文革中的“群众大民主”。某些新左派对文革中此类侵犯基本人权的事总是倾向于说是“落难精英”构造出来的故事。然而这确实是我亲眼看到的一个最普通的工人在群众性的大民主中的遭遇。事情虽过了二十几年，但当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

你说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了几千万人，并没有什么了不得，换了印度死人更多。你说得那么轻松，好像是小菜一碟。以致于我不知如何反驳你才好。正如有人说一加一就是等于三，我不知如何回答一样。因为我们想论证的是一加一等于二啊。不知怎的，我在这里听出了类似于波尔布特的逻辑。

中国现在确实有许多问题，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作为社会中最具敏感心的人群，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自己的思考与批判。中国有太多的腐败、官僚病、社会上存在着种种不公正，有些特权人士的不当得利行为确实骇人听闻，但总的方向是对的，决不能因为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消极现象而否定历史的大方向。而新左派要回到文革去，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这

使我想到了小时候读到的一则安徒生童话，说的是一个人总是说中世纪如何好，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真的回到了中世纪，于是他发现那才是一个真正无法容忍的世界。如果问什么叫文化浪漫主义，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实在是再形像不过了。

说实话，最近一两年来，我对二十世纪思潮与主义的发生史产生浓厚的研究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出现“新左思潮”这一文化现象，这使我意识到左的思潮在中国确实有着肥沃的土壤与温床。我确实很想研究，为什么会如此。

新左派在当下中国的出现，应该看作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当然，作为一个关注当代中国思想的学者，在正式写研究文章时，我自然会以尽可能同情与客观的态度来探索它的内在理路，它得以产生的社会条件与原因，它的价值关怀，以及它作为一种批判思潮在日渐多元化的中国社会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性。然而，作为一个思想者，我仍然从当下中国这种左派复归的现象中，感觉到我们这些生活于观念世界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顽强的根性：即理想型知识分子往往是靠某种观念“鸦片”来生活的。这原来是法国作家阿隆的话。

这种知识分子往往有悲天悯人的责任感，对问题与矛盾深怀解决的渴望，但他们却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投射到某种经验世界无关的“第一原理”与不证自明的“公理”上（例如抽象的公平、群众性的大民主，等等。）并且以浪漫主义的激情，把某个个人或理论加以审美的理解，而并不关注这个事物本身究竟如何。他们不但把谬误当作善来加以误读，而且他们对现实中的又以这种被他们审美地“创造”出来的神话，作为社会施工图，来改造生活与社会。他们对现实的经验世界与经验的逻辑并不感兴趣。

如果把新左的文章作为思想史资料却弥足珍贵，因为他们实际上重演了一段喜剧式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左派观念发生史。他们把左派最突出的弱点，即把某种公平理念抽象化、浪漫化并予以反历史的美化方面，以漫画的方式发展到极端与荒谬的地步，以致于读上去都觉得好笑。

新左派的对文革的浪漫无边际化，好在文革又恰恰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中国，人们记忆犹新，轻信者极少。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赞美语反过来恰恰为人们提供什么是政治浪漫主义的典型材料。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痛，其实伤疤没好也会忘了痛，如果你会用鸦片或其他麻醉药来镇痛的话。只要人们需要精神鸦片，各种“左派”就会不断出现。当然，一定程度上，社会中确实有问题，有不公正，这就为寻求鸦片者提供了存在的条件。

尽管如此，我并不认为有新左观点的人都是完全没有现实感的。我所接触的许多新左派朋友都是有纯真的良知与热忱的。我引用了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的观点，只是想形像地说明什么是新左的文化浪漫主义而已。

前些日子你寄给我一篇王力雄谈毛泽东与文革的文章。你在该信中所谈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好，大意是，左的东西是对右走到极端而作出的反动。你的这一看法甚获吾心。如果再向前迈一步就好了：你应该意识到，左只是对另一种错误方向的错误的反向运动而已，它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应该从文革这一历史中汲取的正是这一教益。相信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是有共同之处。

你给我的来信中说：“当自由主义在这类问题上的教宗地位，要靠无情的思想和言论钳制来维持时，这种自由主义，还可称之为自由主义吗？”我虽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我还是要为他们辩护几句。他们决不是当下中国的“教宗”。他们更没有什么“无情的力量”和资源来钳制别人的思想。他们在求索、在思考，处于边缘，往往有些无奈。如此而已。相反，老左派曾经是中国数十年的教宗。新左派是前教宗的侄子。或者是由于这一层亲缘关系，或者是由于基因相

近，克隆较易。他们现在生活得实际上颇为自由而畅快。因而可能过得更有滋有味。你久居海外，对此没有感受。

顺颂冬安。

功秦即日

~~~~~

## 【往事追忆】

### 红卫兵小报和我（十八）

• 周孜仁 •

（续上期）

#### 17，我所亲历的六五大血案

上面说到的、有关中央五条下达时重庆大学发生的荒唐故事，我不在场。当时，我正在由武汉开往重庆的船上。

从北京返回，我没有坐直通火车，而取道武汉，乘轮船溯江而上。取道武汉，一是因为革联会被否了，我心情太差，想乘机去看看三峡风光。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这条风景线路我在早几年前就曾走过。主要原因是：我有个姐姐在武汉工作。我叫她七姐。她是我们家兄弟姊妹中长得最漂亮的，我从来认为把她的照片登上当时最受欢迎的《大众电影》封面，绝不会逊于任何当红明星。而这也不是主要的，更要紧的是：她是我们家兄弟姊妹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因此我一直就把她视为我们家族的骄傲和我生活的偶像。整个大学时代，凡遇思想问题，我都给她写信，而一收到她的回信，我的思想问题总是非常愉快地顷刻化解。比如：上大学时，家里每月给我寄12元生活费，这12元的消费内容首先包括9元的伙食费，然后是书籍费、洗理费等等，甚至还要从中省出假期返家的车票费，够紧张了，比很多领助学金的同学还困难。于是我就向校方提出了每月3元的补助申请——姐姐一听就急了，马上来信对我讲述国家如何困难，青年人应如何树立革命人生观、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等等，同时还寄来姐夫成色尚新的旧衣服旧胶鞋各一：我羞愧难当了，马上找老师收回了申请。当然，遇到思想问题的时候，我也常常向政治辅导员忏悔，只是政治辅导员太一本正经，而姐姐的教导却充满暖暖亲情。

这一次的武汉之行当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武汉地区的文革形势本来就晦明莫辨。姐姐是共产党员，姐夫是南下干部，大小属于“当权派”级别，文革中都已经失去光辉。他们自己也面临许多困惑呢。在姐姐家呆了两三天，憋得难受，很快离开了。从武汉到重庆整整需要五天工夫。5月24日一早出发，28日下午才到达朝天门码头。下面的日记记录了当时的心情：

“5月25日。万里晴空。/船在辽阔的大海一样的长江上航行了一天。/山城的斗争，到底进行得怎么样呢？我不知道。在船上，什么都听不到。

“5月26日。阴。/已经第三天了。昨天下午三时，船过沙市；今天凌晨2时，船过宜昌，逆流而上，便已进入西陵峡了。大约四点过，从梦中醒来，披衣起望，两岸已是群峰壁立，岗峦起伏，淡淡的夜色里，构成一道暗蓝色的长城/在船上，真的像到了世外桃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什么消息都听不见。”

“5月27日，星期六。雨。/船在航行。/驶过幽暗的峡谷，绕过险恶的滩头，白天黑夜，不倦地前进着，驶向山城……/船没有在奉节过夜，今天上午9点，船到万县，刚一停船，我马上就跑上岸去，我多么想在大字报上找一点关于我们重庆的消息！/街上，大字报很多，但关于重庆的消息很少。在一个剧团门口，喇叭吵得特别厉害，在一条一条地数落重庆伪革联的罪状。/另外，在街上还看到一个重大815和建院818合办的宣传拦。上贴《815战报》和《818战报》各一。815战报是5月19日出刊的，第一版是重大815关于重庆时局的严正声明，口气很硬/在街上，还有所谓重庆来信，嘲笑伪革联垮台了，重大815公开写大标语反中央。并一半人上京告状云云/我的心啊，早就憋不住了。它飞了，飞到战斗的山城去了。/此刻，我们的815，到底怎么样了？……”

重庆等待我的，是一派刀光剑影。中央五条没有给山城带来和平。尘埃落定，八一五已经明白自己是真正的胜利者了。他们显然希望不战而将天下一统之，于是便以胜利者常有的宽容挥舞橄榄枝，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呼吁和平，仅5月31日出版的《815战报》23期一期，就有如下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立即停止武斗”、“立即停止内战”、“同志，你的枪口对准谁？”。6月3日第24期又发表大块文章：“致西师八三一和交院九一五等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呼吁停止内战。但831心里明白，同意对方的和平呼吁无异于束手就擒。他们与其被蚕食消解，宁愿拼个鱼死网破。一年前，刘少奇的“五十天白色恐怖”，用仇恨帮助毛泽东培养了一支别动队，使毛顺利开始了倒刘运动，那么现在，二月镇反炼炉里煅烧出来的，就不再是那么听话的天兵天将了。他们已经窥破政治斗争的许多诀窍。他们是潘多拉魔瓶里放出的魔鬼。八三一必然不会傻乎乎地任人摆布了，他们懂得要夺取政权，必先搅乱局面，从而寻找机会。于是，就有了不断升级的舆论：“警惕没有伪革联的伪革联”、“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誓与山城赵永夫血战到底！”，重庆也就有了大大小小的摩擦。赵永夫是当时青海省军队的一位将领，据说因镇压群众而被中央点了名。

下面是我能根据日记能回忆起的事件：

5月28日，砸派召开大会粉碎炮打中央的反动逆流。称：“重大815不投降，就叫它灭亡”。815立即回敬：谁要815投降，先把头颅交上。

5月30日，重大815四名同学前往重庆医学院张贴大字报，遭对方围攻并殴打。回校时，全团正在风雨球场召开辩论会，于是疯狂的掌声把被打的同学簇拥上台，其中一位沿半圆形台口绕行一遍，将鲜血淋淋的背部展露给全体同学，顿时激起满场怒不可遏的仇恨旋风。

5月31日，815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邹茂林“烈士”追悼会。邹茂林系重庆石油学校学生。怎么被打死暂无资料可考。《815战报》26期上有一篇邹茂林母亲的悼念发言，题目是：“红卫兵勇献青春，烈士志气贯长虹”。发言除了一些流行的豪言壮语和孩子如何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之类的事迹，对邹的死情只字未提。因此现在我只能知道他死时仅仅19岁。而刊在《815战报》上那张稚气未脱的照片，则完全可以确认他定然是母亲面前的乖娃娃。

6月2日，重大815数百人前往重医递交照会，就5月30日同学被打一事提出抗议，又遭医学院及航锋（河运校砸派）毒打。在那天的日记里，我写了这么一段话：“人们懂得了，对于景阳岗上的老虎，没有什么可以忍让的余地。武装起来！用战斗粉碎反革命的进攻！我们也要武装起来，每人一把弹弓，每人一根棍棒，每人一顶藤帽，把每一座大楼，都筑成一座堡垒。”关于这件事，我很快就看到了现实的样板，某天去石油校，天已快黑净，可校园内依旧一派繁忙。男男女女，全是半大的中学生，来来往往地扛石条，用废纸包石灰、用铁锤砸石块以作“弹药”，在每一面窗户上挂草帘以为掩护。和革命电影《地道战》上老百姓对付“鬼子”进

村时的繁忙景象毫无二致。重庆大学的校园后来武装得更现代化：当时沙区最高的建筑物，六教学大楼门前，甚至架设了七弯八拐的管道和巨大的高压喷射装置，其威力足以致人死命。

（未完待续）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